



日本文化在香港

李培德 編著



日本文化在香港

日本文化在香港

李培德

編 著

香港大學出版社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大學出版社

香港田灣海旁道七號

興偉中心十四樓

© 香港大學出版社2006

ISBN-13: 978-962-209-798-8

ISBN-10: 962-209-798-7

版權所有。本書任何部分之文字及圖片，
如未獲香港大學出版社允許，
不得用任何方式抄襲或翻印。

本社提供網上安全訂購保障

<http://www.hkupress.org>

彩印製作有限公司承印

作者簡介

〔按姓氏筆劃次序排列〕

王向華

香港中文大學人類學系畢業，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博士，曾留學日本亞細亞大學，現任香港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

李浩昌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畢業，香港大學文學碩士，日本電影評論家，筆名舒明，現任香港理工大學包玉剛圖書館期刊部主任。

李培德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東京大學文學碩士及博士，現任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研究〕。

何俊英

香港中文大學電子工程系畢業，日本慶應大學工學博士，現任日本環保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吳偉明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國際關係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哲學博士，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副教授。

梁安玉

香港大學英文系畢業，日本筑波大學日本研究碩士，上智大學文學博士課程，英國布力斯圖大學博士候選人，現任香港理工大學英文系助理教授、香港日本語教育研究會副會長。

陳文耀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小學教師。

陳嘉適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部畢業，京都大學農學碩士，香港大學哲學碩士，現任職李錦記國際有限公司市場部。

馮錦榮

香港大學中文系畢業，日本京都大學文學碩士，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趙達榮

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日本早稻田大學經濟學碩士，和東國際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主席，香港留日學友會理事會顧問。

鄭玲玲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中學教師。

羅燕妮

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畢業，現任該系研究助理。

前文

日本社会に関する捉え方には、同一性Conversionを強調する考え方がこれまで多く見られたが、最近は、むしろ日本社会の多様性Diversificationを議論する傾向が見られることが新しい特徴といえる。その多様性の中には、日本の中の地域的な特徴の違いを見ようとすることや、時代的な変化、世代的な違いなど、いくつかの異なるアプローチが見られる。この傾向は、日本を多面的に理解しようとする上で、とても大切であるといえるし、1990年代以来の日本と世界の、そして香港それ自身の大きな変化の中で、多面的な見方がいっそう重要性を増えしてきているといえる。

本書も、基本的には多様な課題によって日本を、歴史的に、社会的・文化的に、さらに政治経済的に見ようとしている点で、これまでには見られなかった極めて特徴のある香港・日本関係の好著である。そして、変動する現在に編集・出版されるという点で、極めて時宜を得ているといえる。

本書の特徴は、まず調査と原資料に基づいて議論の根拠が客観的に示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これはすべての論文について言えることであるが、とりわけ香港の日

本人墓地の調査、香港上映の日本映画に関する詳細な資料調査、香港ヤオハンの調査、香港所蔵の和書に関する調査、関連年表や関連文献一覧などは、多くの時間を費やし、工夫を重ね、さまざまなエネルギーを費やした貴重な論考である。

第二の特徴として、本書に含まれた論考は、それぞれが高い専門性をもった学術的な価値が高いもの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各論考は、歴史学、社会学、人類学、言語学、文学、などの学問分野の方法的な厳密性を持ち、それに基づいた緻密な分析が行われている点をあ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な広く、かつ専門的な日本研究、香港・日本関係研究、香港における日本文化研究は、本書をもってその大きな基礎が築かれた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第三の特徴は、各論考の中に、これまでの日本や香港に関する「通念」や「通説」を見直す重要な論点が表示されていることである。それらのすべてを挙げることは紙幅の関係でできないが、そのいくつかを見てみたい。李培徳論文が指摘する、「日本明治維新のアジアにおける意味の検討する際に、香港の役割に注目する必要があること」、羅燕妮・陳文耀論文が指摘する、「香港日本人墓地に埋葬された死者に、九州出身者とりわけ長崎県出身者の女性が多いこと」、馮錦榮論文が指摘する「脱亜と興亜は表裏一体の議論であったこと」、呉偉明論文が指摘する「香港における日本文化は、日本から直接に到来したというよりも、台湾などを經由してきており、香

港へ入ってからは、純粋な日本文化というより、むしろ雑種文化としての特徴をもっていること」、などの各論点は、日本の近現代史を議論するうえで基本的に重要な論点であり、これまでの「通説」に対する見直しを迫る論点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このような多くの斬新かつ思い切った議論がなされている点も本書の重要性を高め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ができる。

最後に、この本に含まれた多くの研究を出発点として、今後の課題にも継続して取り組む必要があると言える。各論考の中でいくつかの今後の課題が指摘されている。それらは、日本における更なる調査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点や、日本の研究者との議論や共同研究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日本における香港からの影響についても本格的な研究が必要であるということなど、今後の取り組みの重要性やその方向性についても多くの示唆するところがある。本書から多くを学ぶことができた読者の一人として、今後のいっそうの香港・日本関係研究の進展と深化を強く期待したい。

濱下武志

元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長

現在京都大学東南アジア研究所教授

2005年8月

序言

〔譯自〈前文〉〕

過去有關日本社會研究的方法，強調「合流」的比較多，最近討論日本社會的多樣性，強調「分流」的傾向逐漸出現，成為一個新的研究特點。這裏所指的多樣性，是從幾個不同的處理方法來看的，包括日本不同地方相異的特徵、時代的變化、世代的不同等等。這種新的研究趨勢，企圖從多角度去理解日本，是十分重要的，特別是自1990年代以來，包括日本和世界，以及香港本身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可以說多角度視野的重要性正在不斷增加。

基本來說，本書是從不同的課題來研究歷史的、社會文化的，甚至政治經濟的日本，是到目前為止尚為少見的研究特點，是香港日本關係研究的佳作。本書處於大變動的時代編輯出版，可以說是切合時宜的。

本書的特點，首先展示了利用第一手資料和實地調查來進行討論的客觀性。本書的所有論文都具有此特點，特別是對香港日本人墓地的調查、香港上演日本電影的詳細資料、香港八佰伴百貨公司的調查、香港收藏日本書籍的調查、港日關係年表、港日關係史研究文獻等，都花了不少時間、工夫和精力，殊屬可貴。

其次，本書所收入的論文，無一不是學術價值較高和

專門性的文章，牽涉到的學科包括歷史學、社會學、人類學、語言學、文學等等，基於各學科的嚴密研究方法，從本書各章都可觀察到有細緻的分析。像這樣俱備廣闊和專門的港日關係研究和香港日本文化研究，本書正建基於上述各學科的龐大理論基礎。

第三，本書各章所論，對於目前日本和香港有關研究中的「一般觀念」和「一般說法」，提出了修訂性的重要觀點。如果要把這些觀點逐一羅列，恐怕由於篇幅所限，並不可能做到，茲僅舉數例以說明之。如李培德論文所指「在檢討日本明治維新對亞洲的意義時，有需要注意香港所扮演的角色」；如羅燕妮、陳文耀論文所指「埋葬於香港日本人墓地的死者，絕大部分是出生於九州、長崎一帶的女性」；如馮錦榮論文所指「脫亞和興亞需有表裏一致的議論」；如吳偉明論文所指「香港的日本文化並非直接從日本傳入，而經過台灣中轉，到了香港之後，已不能說是純粹的日本文化，而是具有混雜文化特徵的日本文化」。以上各點，都可成為討論日本近現代史的重要觀點，並可糾正目前的「一般說法」，別具意義。這些嶄新和大膽的討論，大大提高了本書的重要性。

最後，以本書所包含的各種研究為出發點，可以說今後仍有繼續研究的必要性。本書所收論文中多提及今後仍有待努力的研究課題，這些課題包括在日本進行更進一步的調查和與日本學者進行合作研究、交換意見，與及有關日本受到香港影響展開正式的研究等等，啟示了今後要致力研究的重要性和方向性。作為向本書學習的眾多讀者之

一，我熱切期待香港和日本關係的研究，今後能夠得到進一步的發展和深化。

濱下武志
前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所長
現任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所教授
2005年8月

導論

香港號稱為國際金融中心，亞洲的國際大都會，但是這些美譽在今天看來都有文化和社會上的缺憾。香港經常被認為是中西文化交匯的地方，一方面代表全球的華人社會接觸和融合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又是西方世界進入和了解中國的橋頭堡，十九世紀中國知識份子王韜曾批評香港為「不中不西，又中又西」。大家可能不會察覺到我們經常說的是「中西文化」而非「東西文化」，儼如中國文化在香港已成為東方文化的唯一代表，¹中國以外的亞洲國家如日本、韓國、印度、巴基斯坦、印尼、越南等，到底香港人對這些國家的文化又有多少認識呢？

香港現在人口約七百萬，其中華人佔大多數，香港人雖然與西方接觸已有超過160年的歷史，但對外國人的態度始終有所保留，例如對西方人通稱為「鬼佬、鬼婆」，對東方人則各色其式，稱日本人做「㗎仔、㗎妹」；菲律賓人做「賓佬、賓妹」；印度和巴基斯坦人做「叉佬、叉婆」等等。年前，港產電影《喜瑪拉阿星》未正式公演便惹來名稱上的爭議，被批評有辱香港的南亞裔人。香港人對於外國人和外國文化，表面上像似接受、融和，但實質上存有不少問題。對西方文化或盲目追捧，對亞洲文化則或心存歧視。

1. 本書的緣起

本書的產生背景，源自一班對香港日本關係有濃厚興趣的朋友，他們大多留學日本，對日本文化和社會除有專業知識外，更有親身體會之經驗。記得從1996年開始，這一班剛從日本留學歸來志同道合的朋友，便曾討論如何在香港進一步推動香港市民認識日本及其研究的方法，當時參加討論的有王向華、林少玲、張展鴻、梁愛琴、馮錦榮、**廖緒豐**、趙雨樂和本書編者。討論的結果是要在香港現有的日本研究課程中加入創新元素，務求更加迎合香港社會現實的需要，實行學術普及化。當時我們認為，語言無疑是溝通文化的主要工具，但過於強調語言而忽略掌握研究的方法、竅門，實在難以有綜合和全面的認識。可惜，由於當時大家工作忙碌，始終未能抽出時間去付諸行動。直至2000年3月，得到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之支持，首次開設這個稱為「日本文化與社會」的課程。兩年後，得到香港日本文化協會之響應，與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攜手合作，共同主辦「日本文化與社會」公開講座，使更多的香港市民能夠參與認識日本文化。

是次系列式講座於2002年3月2日至5月4日期間逢周六舉行，以一小時演講，半小時討論的形式，專題式介紹日本文化和社會的各個方面。我們特別採用廣東話而非英語或普通話演講，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可以跨進學術門檻，接觸到日本研究。我們把講題盡量本地化，把香港放入分析問題的脈絡裏，用深入淺出的入門式辦法，目的是讓更多的人容易了解，啟發他們有進一步探討日本研究之興趣。

講座內容涉及日本政治、經濟、社會、商業、宗教、歷史、科技、文學、語言、中日關係、港日關係等，最後還舉辦了一次綜合性討論香港日本研究的座談會，得到相當不錯的反應。

2. 香港的日本研究

香港與日本經濟關係密切，日本的商品和消費文化已深入社會各階層，繼中國以外成為第二個對香港社會和文化產生重要影響的亞洲國家。不過，港人對日本的了解甚少，多只限於表面的商品、流行文化。據統計，近十數年來香港每年都有數十萬的市民遊覽日本，但試問除了一般消費娛樂、購買慾的舒展外，有多少人會注意日本的文化和社會特點？

日本於亞洲有鮮明對比的獨特形象，雖於二次大戰發動侵略失敗，但戰後卻迅速復元，於六十年代中期冒升，一躍成為世界超級經濟強國。日本的文化、歷史，與中國關係源遠流長，於古時全面模仿中國，大量吸收亞洲大陸文化，但最終卻不成為華夏文化的附庸，相反堅持自己有獨特的文化傳統。八十年代初期，日本經濟蓬勃發展，使其躋身於世界受矚目國家行列，美國學者提出「日本第一」〔Japan as number one〕論，研究日本的機構和組織如雨後春筍，於歐洲、美洲、中國、東南亞等國家大量湧現，「日本研究」〔Japanese Studies〕或「日本學」〔Japanology〕更成為獨立的專門學科。在香港，日本研究成為本地最受關注的外國研究之一，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

大學先後成立日本研究學系。其實，香港於推動日本研究方面已創下不少成績，於日本語言、歷史、中日和港日關係各方面，經多年來的努力，已取得相當不錯的成績。

不過，由於戰爭的關係，亞洲國家始終對日本心存顧忌，要客觀地接受日本文化，談何容易，加上去年四月以來在中國內地發生的反日風潮，今天去談日本研究，相信會比起過去有更多的障礙。今年是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同時也是中國對日抗戰結束六十周年紀念，在全球都響起譴責戰爭的聲音之中，香港固然不例外，多個團體舉行紀念活動，聲討日本於戰時所犯的罪行。值得注意的是，香港雖然毗連中國，與內地關係密切，但並沒有捲入中國的反日浪潮中。如果說台灣有「哈日」，內地有「反日」，則香港應有怎樣的對日態度呢？香港是否有另類華人社會的對日態度，很值得我們去討論。

3. 本書的內容重點

本書收錄的文章，都是源於上述「日本文化與社會」一系列之公開講座，首先由原講者將講稿整理成文章，然後進行校外評審，最後依據評審報告作出補充或修訂。羅燕妮〔與陳文耀合寫〕、吳偉明、梁安玉的文章後來由編者約稿，他們的加入，使本書內容更加充實。本書主要分為三個部分：早期香港日本文化和社會關係；當代香港的日本文化；香港的日本研究，其中包括港日關係大事年表和參考書目。

香港雖為彈丸之地，但由於種種的歷史和地理因素，

如濱下武志所指，香港具有強大的「網絡」功能，影響着中國和廣大的亞洲國家和地區，於亞洲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方面，都可見到香港的網絡作用。²過去，我們只把注意力集中在香港與中國的關係上，大大忽略了香港與其他亞洲國家的關係。其實，香港與日本有着很密切的交往，如果我們細心看李培德的文章，便會發現早於鴉片戰爭結束後的不久，在這個剛開闢的維多利亞新城裏，已經有日本船來港的蹤跡。從香港開埠到現在的一百六十多年的歷史裏，港日關係可謂經歷了幾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總括而言，在十九世紀香港一直扮演着日本於亞洲吸收西洋文明和觀察中國動態的「網絡」角色。在日本實行明治維新以前，可以大膽地說，日本通往世界的交通航線，大多經由香港，因為這樣的原因，日本對外界的認識，多來源自香港。

如果說鴉片戰爭前亞洲的國際關係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制度來維繫的話，那麼鴉片戰爭可謂是破壞原來亞洲秩序的元兇，隨朝貢秩序崩潰而來的歐洲殖民勢力從印度、東南亞延伸至東亞，使亞洲的歷史舞台除原有的中國人網絡外，更多了來自歐洲的英國網絡。朝貢制度雖被破壞，但中國人的網絡並沒有消失，華裔移民滲透亞洲每一個國家，部分華商更與歐洲殖民勢力結合，借助其於亞洲的影響力，將網絡延伸開去。日本是一個獨特的亞洲國家，她不僅沒有參加中國的朝貢體系，在豐臣秀吉時代，日本甚至要求在馬尼拉的西班牙總督和在果亞的葡萄牙總督向日本稱臣和差遣朝貢使節。此外，日本與中國的藩屬琉球一直保持微妙的關係。面對中國和西方於亞洲的強大